

中国往事

真实的历史
同样动人心魄



讲述清朝



王连升
主编

「下」

山西出版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往事

主 编 王连升
编 委 于宝华 马俊明 王连升 杜家骥
刘洪涛 张荣明 孙立群



讲述清朝

下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述清朝. 下/王连升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0. 3
(中国往事)

ISBN 978-7-5440-4114-0

I. ①讲…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932 号

出版策划 荆作栋 刘立平

项目主持 赵 峰

责任编辑 杨 文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荆作栋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 7 号 电话: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6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4114-0

定 价 16.00 元

真实的历史，同样动人心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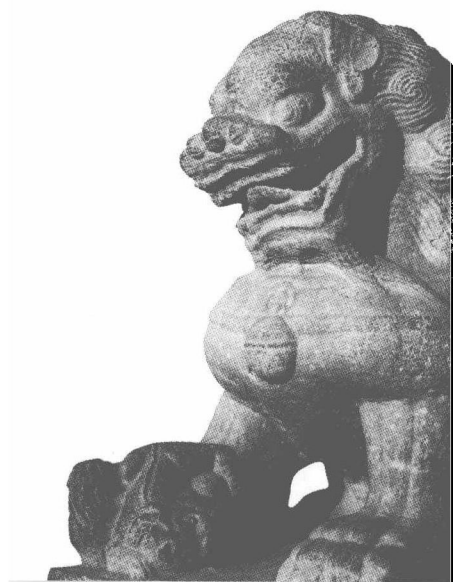


目录

中国往事

帝国大门关闭了——关闭三海关	1
无法进行的“双边经贸谈判”——马戛尔尼来华	5
大奸臣的厚黑学——和珅擅权	11
钦差大臣与英国毒贩的较量——虎门销烟	17
四千英军攻破万里海防线——第一次鸦片战争	24
耶稣弟弟带着大家去造反——金田起义	31
天国也有大屠杀——天京事变	39
上帝不再保佑——天京保卫战	44
是谁烧了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	52
拱手相送万里江山——沙俄侵边	59
太后与顾命大臣的决斗——慈禧垂帘听政	64
向“老外”学习——洋务运动	71
外交奇才曾纪泽——中俄西北改约	77
老将血洒镇南关——中法之战	81
沉没在渤海湾的强国梦——中日甲午战争	86

日本“绑票”辽宁——三国干涉还辽	94
巧取豪夺，连骗带抢——列强瓜分中国	99
一群学生的请愿——公车上书	103
一百天的改革——戊戌变法	110
神灵附体，扶清灭洋——义和团运动	116
圣旨扔进废纸篓——东南互保	127
“新政”五年，老调重弹——清末“新政”	132
响彻午夜的枪声——武昌起义	135
末代皇帝黯然收场——溥仪逊位	142





帝国大门关闭了

——关闭三海关

清政府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总的来说是闭关自守。

清统治者入关之后，在对全国的统治尚未建立和巩固之前，在对外关系政策上还没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就在清统治者全力进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时候，以郑氏集团为首的一股抗清力量占据着台湾，进行抗清活动，清政府虽多次派兵进行清剿，但郑氏的抵抗活动在福建沿海一带仍十分活跃。有鉴于此，清政府欲采取断绝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使台湾失去大陆支持的手段，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下达了海禁之令，要求官民人等不准擅造两桅以上大船，不准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严禁“潜通海贼（指郑氏集团），结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同时还命令，不准造大船卖给番国，也不准将大船租给出洋之人，对违反以上规定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从这个命令可以看出，清廷发布此令是针对占据台湾的郑氏抗清力量的，同时，这个命令也限制了沿海居民出海进行正当的商贸活动。

次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海禁政策，以“海氛未靖”为由，提出凡是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处以死刑，没收其货物。凡沿海地方关口，要处处设防，不许船只入口。顺治十七年又颁布了一个迁海令，令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边境居民迁入内地。

海禁及迁海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扰乱了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也使对外的商贸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沿海一带的城镇没有了以往洋货云集、外币流行的局面，而出现了冷落与萧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康熙初年，沿海诸省的地方官曾就因海禁而导致

的人民生计困迫的状况，要求放宽海禁。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再次奏请开禁的时候，康熙皇帝才答应“应如所题，照旧展界”。但此时清政府已着手对台湾的武力统一，当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被统一之后，清政府于次年才彻底解除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海禁，允许百姓在海上自由捕鱼，商人可出海买卖货物，完全取消了对国内商民的限制。又过了一年，清政府以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南的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商船只来华交易，并设置了海关，经营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宜。



广东十三行

正当清政府正常地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同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为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他们肆意扩张，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方，而中国则成了他们寻求海外市场的主要对象。

从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先是荷兰以帮助清军剿灭郑氏抗清力量为由，要求与清政府通商，而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至沓来，尤以英国行动最为迅速，要求也最为强烈。康熙二十三年，英国终于在广州建起了商馆，与清帝国的通商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清政府对外商来华贸易不是采取放任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自身的商贸利益，中国在与外商交往中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英国等国家在中国要取得更大的商业利润，扩大中国商品市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以往同中国通商并未获得更多利益的状况已十分不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改变不利的局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最终又导致了乾隆统治时期对外关系政策上的重大变化。



康熙年间曾开设了四海关为通商口岸，但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对华贸易数额不大，因而通商地点习惯上仍集中于广州一处。到乾隆时期，中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广州一口通商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加上广州为中国唐宋以来市舶司所在地，是中国经营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故这里由于多年的经营，积弊亦为不少，各种陈规陋习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极为严重，外商的商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清朝以粤海关代替市舶司行使征收关税、监督货物交换等大权及建立公行制度，由公行行商代理外商进行商品购销等等，都对外商的经营活动以极大限制，外商在广州经商也甚感不便。因此，英国等国商人欲离开广州向北到宁波等口岸寻求更好的通商之地。康熙四十年左右，英国的三艘商船曾到浙江的舟山、宁波等地，试行贸易，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清政府虽然奉行四口通商政策，但实际上从海疆的安全考虑，清政府仍然倾向于外商到广州一口经营贸易，尽量不让其到其他三口来，以保持三口及附近地区的安宁。因此，清政府采取不再增加广州税额的措施，吸引外商。同时，只要外商船只驶往其他各口，地方官员就令其返回广州。这样，清政府采取的“不禁之禁”的政策，实际上仍然维持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

但是，粤海关独揽外贸大权，在原来恃特权而腐败的基础上更加腐败，公行行商对外商贸易的垄断也日益严重。按清政府的规定，外商来华，所携货物需交行商代售；采购中国商品，也由行商代办，而粤海关对行商进行监督及管理。这样，作为中外贸易的管理机构——粤海关和中介人——公行行商，完全控制着外商的所有商贸活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粤海关监管下的公行已发展到二十六家，对外商实行着全面而严密的控制。外商在广州进行交易，要缴纳较重的商税，而且，清政府坚持的行商制度和粤海关对外商的无厌勒索（在正税之外，还有许多随意增加的额外之税及外商难以忍受的陈规陋习），使外商极为不满。

为摆脱此种困局，外商再把注意力向广州以外口岸如距离中国内地较近、各种产品价格又颇低廉的宁波等地转移，因此，从乾隆二十年以后，一些外国商船直接到宁波进行贸易。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派喀喇生、洪任辉率两艘商船来到定海，愿在此纳税，运货至宁波贸易。另外，外商为摆脱行商的控制，也千方百计与中国商民直接进行交易，外商与中国商民直接接触的现象时常发生。

对于这些新的问题，以一向把海防看得重于通商的清政府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大问题。在通商事小、海防事大的原则指导下，出于巩固封建专

制统治的政治需要，乾隆皇帝开始考虑将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严厉限制对外贸易和外商活动，以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他指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照广东海关则例，酌量加重税收，以达到“彼（外商）不期禁而自不来矣”的目的。

然而，由于浙江货价比广东便宜，即使增加了关税，外商依然有利可图，故外国商船仍不断涌向浙江，清政府所谓“不禁之禁”的办法未见明显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限制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冬，乾隆皇帝责令闽浙总督杨应踞向外商宣布：凡外国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其返回广东，不准入浙江海口。同时，也责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将这一命令晓谕在广东的外商。这样，康熙年间开放的四海关，又只剩广东一关，清政府强行关闭了其余三个海关。广东一口通商的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

从关闭三海关之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是呈严加管理、严格控制的趋势。

乾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洪任辉到宁波贸易被拒绝，便率船贸然来到天津，企图上北京状告广州海关和行商。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乾隆皇帝对外商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毫无顾忌的行为感到震惊的同时，也隐约地感到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有一种作为后盾的政治势力的支持，隐约地感到了这种政治势力对清帝国统治的威胁。因此，当两广总督李侍尧针对“洪任辉事件”的发生，提出五条防范外夷措施之后，乾隆皇帝欣然同意，批准立刻实施。这五条防范措施的主要内容，一是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间有因事过冬者，也只能居住在澳门；二是外商到广东，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是禁止借领外商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四是严禁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五是酌拨营员弹压稽查外国商船停泊处。很显然，这些措施是严格限制外商活动的，对加强清帝国的国家安全是有利的。此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限制外商、控制外贸活动的政策，如嘉庆十四年（1809年）颁布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和十五年制定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章程》等，都旨在强化外贸体制，使对外政策趋于闭关和保守化。

而正值此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强烈的向外扩张的欲望，与清政府趋于闭关的外交政策形成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之下，清政府采取的带有自卫性质的限制政策，显然抵挡不住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冲击。虽然从乾隆中叶关闭三海关，实行一口通商的政策，暂时维持了独立自主的局面，并且在表面上也可反映出清帝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最终导致了清帝国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被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强行打开了关闭着的大门。



无法进行的“双边经贸谈判”

——马戛尔尼来华

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以为堂堂天朝对外无任何需求，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态，使得清帝国与外交往时，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以为他国对自己有所求，而自己对他国则无所求。这种指导思想及当时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基本国情，导致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以政治需要为先导，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更对外政策的基本倾向。

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抗清斗争，清政府为切断其与大陆的联系，实行了严密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沿海居民，特别是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的自由，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受到极大影响。顺治、康熙初年，荷兰、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国家曾派使节到北京，要求清政府开放通商，但都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词拒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清政府在第二年开放了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但由于种种限制和水陆交通的不便，对外贸易实际上仅集中在广州一处。

当时世界总的形势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寻求国外市场，而封闭的清王朝仍只敞开广州一处小小的门缝，显然，作为东方大国和广阔的市场，清政府这样做是不能满足西方列强要求的。如何使中国关闭着的大门敞开，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而英国则充当着交涉国中的急先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之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始。后来英国在广州设立

无法进行的
「双边经贸谈判」
——马戛尔尼来华

了商馆，英对华贸易额逐步上升。到 18 世纪末，英对华贸易值分别占欧美国家输入、输出值的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七十左右。所以，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关系着英国的利益。但是，清政府的开放是有限度的，通商贸易所允许的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以很小的规模、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而且，清政府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来华贸易国的一种恩典，绝不是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马戛尔尼

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重大变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鉴于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出现的违法行为，也出于国内政治安定的需要，清政府明令取消其他几个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为限制外商，又强化了广州的公行制度。公行的职责，一方面是受官方委任，代理进行向外商征收租课；一方面又受外商委托，办理纳税事宜。公行行商实际成了双方的全权代表，而且代客买卖、商务管理、对外商行为的监督等权力，也操纵在公行及行商手中，使外商在华贸易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地方官员对外商来华贸易，也多持消极态度。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两

广总督李侍尧就向乾隆皇帝上奏“防夷五事”，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外商在华过冬、役使华人、雇华人传递信息及对外商、外商船停泊处严加管束稽查等。种种限制使外商甚感不便，特别是对英商来说更是如此，商贸活动很难开展起来。

为确保英商在华利益及顺利进行商品输出、资源掠夺等活动，在英国的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种与清中央政府进行官方交涉的呼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本积累的迫切需求，促使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考虑如何打开中国这个东方大市场问题，决定派遣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与清政府进行官方接触。

1792 年，英国组成了一个以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使团除设有正副使之外，主要成员包括秘书、翻译、医生和精通天文、化学、航海技术的专家及武装卫兵等，携带有能显示英国国力和科技水平的航船模型、望远镜、天文仪器及精美的纺织品等。使团分乘“狮子号”、“印度斯坦



号”和“豺狼号”三只船，组成了一个八百多人的“使团舰队”。

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经英吉利海峡往西，朝中国方向航行而来。使团出发之后，英国政府责成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致函两广总督，正式通知清政府马戛尔尼使团奉命访华。当时清政府对英使访华的真正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以为是英国向清帝国派来的“贡使”，并以为是乾隆皇帝祝寿而来，故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乾隆皇帝下发谕令，指示各地方官要做好接待工作，同时也指出接待远道来的客人，要丰俭适中，不卑不亢。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到达澳门，广东巡抚立刻向北京报告，六月十八日，使团抵达天津的大沽，长芦盐政徵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天津宴请了使团。使团在天津逗留数日，由徵瑞陪同前往北京。到北京之后，他们先被安置在城外的宏雅园居住，尔后又移住城内。七月二十九日，使团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临行前，双方就觐见乾隆皇帝的礼节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清方代表徵瑞提出马戛尔尼见皇帝时要行跪拜礼，而马戛尔尼执意不肯，说：“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争执未果，双方不欢而散。使团到达承德之后，继续商议礼节问题，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中方再次提出行跪拜礼时，马戛尔尼说：“若一国特派之使臣，对于他国皇帝所行之礼，重于对本国皇帝所行之礼，无论何人，决不肯承认。如必欲相强，吾唯有坚执前议，请贵国先派一与敝使职分相同之大臣，向吾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敝使即唯命是听。”

徵瑞问：“倘不肯行中国礼，即行英国礼亦属不妨，但不知英国礼是何式样？”

马戛尔尼回答：“英国礼乃屈一膝持陛下之手亲之。”

徵瑞惊诧地问：“这事在咱们皇上面前使得吗？”

马戛尔尼以自信的口气回答说：“自然使得。敝使以见本国皇帝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何言使不得？”

最后，双方商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皇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了吻皇帝手的礼节。这样一种觐见礼节，对乾隆皇帝来说还是第一次。相持不下的僵局，总算因双方的让步而缓解。

在觐见皇帝之前，马戛尔尼由徵瑞陪同，先同大学士和珅进行了会晤，马戛尔尼先以谦恭之词说：“敝使由于长途跋涉，身体颇累，未能早日拜见，非常抱歉！今身体已经复原，特来向中堂（和珅）请安。”随即提出“愿早日觐见皇帝，俾将吾英皇亲笔信札呈阅”的要求。和珅见英方急于觐见皇帝，便

无法进行的「双边经贸谈判」——马戛尔尼来华

决定三天之后由他亲自引见，到承德拜见乾隆皇帝。

八月十日清晨四时，马戛尔尼及副使斯当东等人来到避暑山庄的万树园，等待乾隆皇帝的接见。一个小时之后，乾隆帝在王公大臣的陪同下，来到万树园，马戛尔尼以一膝屈拜，然后将所带礼品及英王书信递呈给乾隆帝。乾隆帝接受礼品及马戛尔尼的问候之后，设宴招待使团主要成员。会见之后，乾隆帝责成和珅等人陪同使团成员在避暑山庄游览观光。八月十三日，使团成员参加了为乾隆帝举行的盛大生日庆典。

在承德期间，马戛尔尼没有机会向清政府提出此次来华的真实意图。而清政府方面也以为英使团来华的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便让英使团着手准备回国事宜。马戛尔尼见此，便在回到北京后不久，立刻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英方的要求，英方的要求主要有开放通商口岸、扩大对华贸易等。

也就是在英方提出要求的第三天，和珅把乾隆皇帝的回信当面交给了马戛尔尼，对于英方提出的种种要求给予了全面的答复：

关于英国派人在北京居住一事，乾隆帝认为：“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今尔国王欲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可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

关于英货船在宁波、舟山、天津等地收泊交易问题，乾隆帝认为：“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已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并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



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者马戛尔尼



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国使臣恳请向浙江之宁波珠山（舟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关于在京设商馆问题，乾隆帝认为：“（北京）从无外籍人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宜，若于京城设行发卖，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遥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尔国既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域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同行。”

关于在舟山附近择一小岛问题，乾隆帝认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乾隆皇帝对英方提出的要求，有理有据地加以驳回，没有丝毫的让步和妥协，有些辞令甚至是严厉的，但对使团及其成员还是以友好的态度，在乾隆帝看来，使团是以祝寿名义而来，又不识大清国体制，故不宜深究。

而对于身负重任的马戛尔尼来说，此次中国之行是满怀信心而来，大失所望而归，因为他除了从乾隆皇帝手中得到赏赐的宝物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日，英国使团离开北京。此前，马戛尔尼曾向清政府提出再逗留二日，企图再做一次说服清政府的努力，但乾隆皇帝已限令使团务于三日离京，此时马戛尔尼的心情显得非常沉重，中方送行官员亦显得非常尴尬。使团乘船沿运河南下，先抵杭州，十二月到达广州，尔后便乘船回国，于次年八月返抵伦敦。

马戛尔尼使团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交给他们的使命，英国欲从清帝国获得外交和商贸特权的目的自然没有达到。但使团通过沿途所见所闻，经过与清政府上层人物的接触，对当时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正如使团的副特使斯当东在回英国不久所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最后写到的：“特使及全体随员在将近两年的期间内为国家完成了一项新奇而微妙的使命。”他们所接触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在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是“前所未有和不可磨灭的”。究竟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什么印象，马戛尔尼是这样说的：“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有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一次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中国，这次出使的目的同当年马戛尔尼出使的目的——一样。使团于六月到达天津，清政府派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接待使团。双方又在觐见嘉庆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这一次，嘉庆皇帝的态度是坚决的，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方可令其入觐”。阿美士德也以各种借口拒绝觐见，双方各不相让，嘉庆皇帝一怒之下，令英使团立刻回国。

英使两次来华，均未达到预期目的，而清政府则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行动回击了英帝国欲通过与清上层人物的接触而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企图。虽然在这种回击中，体现了清王朝于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而不顾，沉湎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自我陶醉中，反映了清帝国故步自封的妄自尊大；但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捍卫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清政府的回绝也体现着正义和尊严，客观上给予英帝国隐藏在“友好使团”背后侵略、扩张的企图以迎头的痛击。



大奸臣的厚黑学

——和珅擅权

乾隆皇帝是清代十分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在他的初政时期，一改先父雍正帝的苛政，以较为宽松的策略治理国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之后，乾隆皇帝继续励精图治，以务实的精神，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贪官，整肃吏治，清王朝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皇帝骄横傲慢、贪图享乐的思想也开始滋长起来，其晚年也完全丧失了初期的勤勉精神和谨慎作风，以致宠用了善于阿谀逢迎、精于政治投机的奸臣和



和 珅

珅，使朝纲大权把持在他的手中。和珅利用手中的特权，营私舞弊、招奸纳贿，在他的影响下，吏治败坏，贪污公行，清帝国由盛转衰。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中等官僚家庭。他的高祖尼雅哈纳凭借军功，曾获得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后来他的父亲常保承袭了这一职务，并一度担任过副都统。

和珅童年时期接受了私塾启蒙教育，少年时期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这是一所为八旗及内务府优秀子弟接受教育而设的官方学校。和珅20岁的时候，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23岁时，被授予三等侍卫，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又被调任到銮仪卫充

大奸臣的厚黑学——和珅擅权